

# 舆情治理视域下 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现象与破茧之道

郑满宁 李 彪

**[提要]** 社交网络的兴起使得人类社会重归部落化,社群化生存是现代人的生存方式。相较于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茧房,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更能决定民众的信息结构、信息质量和价值立场,社群成为民众获取外部资讯的第一媒介和中介,其塑造的回音室效应使得社群内同质性和群际异质性双向增强,产生的信念回响效应增强了虚拟群体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本文分析了职业、性别和网络世代三个最为典型的舆情遮蔽,认为“后真相时代”建构“后共识”更为重要,“破壁”和“出圈”、构建情感按摩机制、重构社会对话秩序和重建群际认同是未来舆情治理的重要路线图。

**[关键词]** 信息茧房;信息偶遇;信念回响效应;舆情遮蔽;后共识

中图分类号: G20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22)04—0140—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网络社群中网民价值观引导研究”(19BXW089)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郑满宁,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 新媒体传播。北京 100089 李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舆论学、新媒体传播。北京 100872

以微信为代表的社交平台的普及使得人类在虚拟空间重归部落化、圈层化,民众从圈子中获得信息、讨论社会事件、构建关系、再生产社会资本、寻求社会归属,圈子对民众进行柔性的权力约束和话语规训,民众依托社群而在网络中存在,传统社会的“原子人”在网络中成为“社群人”。

## 一、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效应强于算法推送下的信息茧房

近年来,有关算法推送的新闻分发方式越来越被学者所关注,观点大抵有以下三种:一是技术决定论,认为算法推送会造成民众只选择自己喜欢的感兴趣的信息接触,这种选择性接触机制会造成自己的生活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从而遮蔽民众认知世界的视野,引发假新闻泛滥、信息偏食、信息茧房、回音室等不良后果<sup>[1]</sup>,长期以往会造成社会粘性的丧失,此种“信息茧房”论最早源自美国桑斯坦提出的半预言式的隐喻<sup>[2]</sup>;二是技术有益论,算法推送使得民众的信息选择权提升,对信息接近权提升及民众话语平权均具显著意义,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算法不仅没有导致用户的信息接收渠道窄化,反倒使其对传统媒体等非算法型信源的信任程度有所提升,并没有导致信息茧房,而是为个体提供了更多元和理性的信息世界<sup>[3]</sup>;三是技术中立论,认为技术掌握

在人的手里,无所谓好与坏,由此而引申探讨算法推送中的伦理等问题<sup>[4]</sup>。以上三种观点都没有否认信息茧房的存在,只是对信息茧房效应产生的作用存在一定的分歧。

还有学者认为信息茧房概念简单化地把互联网时代用户当做算法制作的“茧”时,似乎对自主用户充满了悲观,这种观点提醒大家讨论积极自主的用户是否存在,提到了用户的主动意识<sup>[5]</sup>。信息茧房学术场域表现出“算法偏倚”与“理论偏倚”两种倾向,不管有没有被实验证实,应尊重信息茧房效应假说本意<sup>[6]</sup>,信息茧房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信息选择性接触行为的总结和隐喻,信息茧房研究者强调算法推送容易造成信息的选择性接触,而选择性接触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趋利避害选择行为——人们只想看到想看的,听到认同的观点,接触跟自己意见相同的朋友,信息茧房效应伴随着人类接触信息的那一刻就开始出现了,并不是当下算法推送造成的。晋惠帝何不食肉糜的典故就是最典型的阶层造成的信息茧房效应,而算法推送只是将这一现象显性化和放大化而已,如报纸时代《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曾一天出版450余版,比书还厚,民众须从中进行选择自己喜欢的内容去阅读,大部分内容都会被舍弃。

相较于算法推送的新闻分发方式,社交圈子形成的茧房和微意见环境对民众认知世界的影响更大,这种茧房是虚拟空间内民众基于某种关系(血缘、地缘、学缘、业缘和趣缘等)形成的社交圈子,圈群的成员具有较高的同质性,与其他圈群之间具有较高的异质性,在回音室和信念回响等效应下,圈子具有了信息把关人功能,很容易形成圈子内的观点极化现象。社交网络中的茧房相较于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茧房的区别在于:一是算法推送形成的茧房更多的是从传者角度思考问题,是传统的单向度传播思维,并没考虑到社会个体是以圈子为单位进行信息获取和观点发表的信息消费现实;二是算法推送形成的茧房只是考虑人们的认知层面,并未考虑民众的价值观形成和行为改变等更深层面,真正对民众的信息获取结构和社会价值观塑造起决定作用的是其所在的圈子、社群,因为虚拟空间社会个体并不是以“原子化”的点形式而是以社群存在,成员转入群内的信息须符合圈子群体固有认知,发表的言论须满足群体的固有价值,这种潜移默化的机制要比算法单向度推送形成的茧房效应更加明显,算法只是决定个体的信息选择性接触,而社交网络对个体从信息获取结构到价值观塑造均具直接作用,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形成也具有更深的社会动因。

(一) 社交网络已成为社群成员获取外部资讯的第一媒介和中介

传统社会民众主要依靠大众媒介获取资讯,因此大众媒体具有议程设置的功能指向,民众的所思所想被大众媒介所设置,但随着社群时代来临,民众更多地依靠自己所在的圈子获取信息,人际关系网超过大众媒介成为民众获取资讯的第一渠道。据相关调查显示,以微信群、朋友圈等为代表的社交圈子(76.5%)已超过广播电视、报刊等为代表的传统大众媒体(17.8%),成为民众获取资讯的第一渠道。<sup>[7]</sup>另外,由于主要依靠圈子获取信息,获取信息的内容和品质也出现了结构性变化,大众媒体设置的话题相对“宏大”,而人际圈子则扮演着把关人的角色——只关注与圈子相关的资讯,圈子内的些许“风吹草动”便可尽收耳底,但圈子外的宏大叙事则可能充耳不闻,圈子本身就是一种媒介,成为沟通圈内成员和外部信息流动的中介。

(二) 社群回音室效应使得群内同质性和群际异质性双向增强

研究表明,人们从头脑相似的人那里获得信息有助于减少信息成本<sup>[8]</sup>。虽然圈子成为成员与

外部世界交往的媒介,但并非所有资讯都可以畅通无阻地进入到圈子内部,必须是那些与圈子固有立场和价值观一致的信息才可以进入到圈子中,“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正如个体在信息接触时内心都有个认知框架,适合自身固有认知框架的信息才被接收和内化,不符合的则嗤之以鼻,换言之,社交圈子内部具有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和回音室(Echo Chamber)效应<sup>[9]</sup>,最终使得圈子内部的成员立场越来越一致,长此以往会逐步固化和刻板印象化,导致圈子的“内壁”增厚。由于缺少全社会范围内的对话公共平台,平时大家相安无事,但一旦遇到公共事件,不管是否涉及本群利益,如有群体成员发表观点,圈子其他成员很容易共鸣而深信不疑——不考虑这些观点是否矛盾,更不管论证推理的逻辑是否经得住推敲。不同圈子之间的沟通与对话的难度在逐步加大,圈子越来越像打地鼠游戏中的“地洞”——圈子内部成员抱怨别的圈子不了解自己所处的群体,希望别的圈子了解自己,希望与其他圈子沟通对话;另一方面又使用固有刻板印象打量着别的圈子,双方对话容易变成“鸡同鸭讲”式的隔空喊话或者“无脑站队”式的激烈对骂,最终结果是双方成见不断加深,对话成本不断加大,社群的“巴尔干化”现象不断凸显,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交圈子型塑了圈内成员的价值立场和社会认知,将社群成员从社群共同体改造成为“偏见共同体”。

(三) 社群信念回响效应增强了社群成员的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

在网络舆论场中很多事件经常被翻转或澄清纠正后,往往并不能彻底改变社群成员对事件的固有认知和固有态度,这种绵长、持续的态度影响(Lingering Attitudinal Effects)被称为“信念回响”(Belief Echoes)效应。一旦社群中成员对某一公共事件达成一致共识,便会作为一种集体记忆框架被社群成员所内化和接受,进而对与之相左的信息产生抵抗和否定,集体记忆趋同也会加强群体内部的凝聚力——拥有相同集体记忆的人会有更强的身份认同,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老年微信群内到处充斥谣言,老年群体拥有共同的集体记忆,对谣言的判断标准和认知大抵是一致的,并且一旦有谣言被转发到群里,便会有其他成员的点赞撒花,对谣言转发者来说会产生一种强大的社会支持虚妄感,这种信念回响效应会进一步增强,形成一种螺旋上升趋势。

因此,相对于算法推送,社交网络对社会个体具有更大的价值观的型塑价值,以往对算法推送形成的信息茧房批判只是从技术出发,很容易陷

入技术主义的窠臼,社交网络形成的茧房不仅考虑到信息的流动,还考虑到了社会互动中的社会资本和话语权的再生产机制,更能准确描绘社交网络崛起后对人的存在方式的本质性影响机理。

## 二、社交网络中的信息茧房形成的三种“舆情遮蔽”类型及影响

现象学研究者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认为,技术绝不只是生存和存在的手段和工具,而是以“座架”(Ge-Stell)的价值而存在的,是对自然的促逼和对世界单向度的解蔽(das Entbergen),“我们以‘座架’一词来命名这种促逼着的要求,这种要求把人聚集起来,使之去订造作为持存物的自行解蔽的东西。”<sup>[10]</sup>(P.937-938) 根据其观点,无论是算法推送还是社交网络,媒介技术作为“座架”为人的理解和生存设置了固有的框架,人类被“促逼”得只能在“座架”限定的框架背景之中进行思考和生存方式的抉择,无法置身之外,只能基于这一底层技术的秩序和逻辑来理解外部世界。从此意义上讲,媒介技术对人类观察世界的解蔽永远是一种单向度的、按照自己的技术架构部分地予以解蔽,解蔽的同时也进行着遮蔽,对照现实生活,就是社交网络在使得社会个体联系密切、交往日益零成本的“解蔽”情况下,也“遮蔽”着个体认识世界的渠道和信息的质量,进而影响到其价值观认知和社会判断。因此,社交网络带来的茧房几乎是一种遍在化的存在,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判断和评价,进而在整个社会范围内产生了“舆情遮蔽”。

### (一) 职业茧房: 危及“职业共同体”建设和社会整合

职业茧房是基于相同职业而产生的民众日常交往的职业小圈子,以往仅是单位同事的线下交流,社交平台崛起后全国范围内从事同一行业的人员可以聚集起来,形成更大的茧房效应。有研究者指出职业共同体建设与社会整合的重要价值,“在今日中国,当家庭的小型化导致它难以承担社会整合的首要机制以后,当改革以前的‘单位制’也衰落以后,推进人们日常交往的小的职业共同体建设成为今天社会整合、社会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的民间基础。”<sup>[11]</sup>但在网络空间,职业茧房日益成为社会整合的障碍和桎梏,如2015年河北肃宁发生特大枪击案中2名警察牺牲,在当晚央视《新闻1+1》节目中因为白岩松称公安干警“死亡”“离世”,而没用“牺牲”,称罪犯为“五十多岁的老汉”而没用“犯罪嫌疑人”,引起了全国警察群体的反感,在各个警察微信群里动员,集体签名向央视发公开信,要求白岩松“道歉”

和“下课”,而另一方面,媒体从业者群体则对白岩松的报道进行辩护,两个职业群体针锋相对搅动着舆论场,使得一个刑事案件成为两个职业共同体的舆论对决。<sup>①</sup>基于医生、教师、警察等职业茧房在涉及自己职业的事件中,会下意识地抱团取暖,对其他职业或关涉群体立场先行地横加指责,不仅没有促进社会学家所说的“社会整合”,还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对话的难度。

### (二) 性别茧房: 女权与反女权互相攻讦撩拨民众敏感神经

鲁迅曾在《娜拉走后怎样》中揭示了娜拉的命运——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经济地位是妇女所有地位的基础和根本,现代社会女性经济地位不断提升,女权运动成为不可逆转的社会大势。经过了几次女权主义浪潮之后,互联网时代的女权主要以摆脱就业歧视,重男轻女,性骚扰等为主要表现,“罗冠军事件”“清华大学学弟咸猪手事件”“癌症母亲为生子放弃治疗却被抛弃”等话题每次都能带来一拨舆情热潮。米兔运动(Metoo运动)为近年来声势浩大的全球性女权主义社会运动,在Metoo运动中由于茧房效应的存在出现了一些极端的情况,个别演变成对男人和性的憎恨,一味地强调女权,出现了凡事女权化和为女权而侵犯别人的基本权力的情况,如《中国青年报》曾评论网络主播Papi酱生孩子因为随丈夫的姓而被网友骂“婚驴”,对争取性别平等无益。<sup>②</sup>而另一方面,由于性别茧房的存在,反对女权的声浪也日趋激烈,相关女权舆论的发展又衍生出另一个反向的分支,即呈现出“女权婊”“女权癌”等标签化的刻板印象。很多舆情事件经常被纳入到性别权力的框架的讨论走向,性别之外其他更为主要的因素反而没淹没,这种情况下性别舆论更为常态化,如车祸事件中女司机常被重点强调、晚婚人群中大龄剩女会被优先强调、女官员提拔被突出报道、高校事件中女大学生被优先设置……这些性别标签被刻意强调,总能撩拨民众心中的性别刻板印象。

### (三) 代际茧房: 社会范围内的代际冲突动摇传统家庭和社会结构

代际冲突,是人类社会亘古不变的主题,不同世代的人在价值观、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不小的隔阂。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逐年攀升,数字化代际冲突成为了中国社会数字代沟的显著特点。代际冲突本质上是一种社群冲突,即年轻的群体对自己的父辈人群、年长者对自己子辈人群的刻板印象之间的碰撞。数字时代的代际冲突不仅发生在家庭场域之中,还扩展延伸到整个社会话语场。

比如2021年5月人民网、北晚在线等报道的《广场舞大妈与小孩争篮球场起冲突》<sup>③</sup>,此类冲突近年来时有发生,常常以报警为结局,每每出现都会引起民众对老年群体的一顿口诛笔伐,而老年群体在互联网上属于话语弱势群体,没法为自己辩解,最终会反过来更加固化对老年群体的刻板印象,因此近年来网上对老年群体的负面评论不绝于耳,归根到底是数字化使得“父权”和“权威”的双向持续衰落,子代的数字权威和数字反哺大行其道。在家庭微观小环境中也存在父辈与子代的激烈冲突与话语权争夺,如网上曾有个案例,疫情期间家族群中不断有亲戚转发谣言,当事人为了提高其亲戚辨别谣言和不传谣的新媒介素养,便刻意转了几条“小伙传谣500次被刑拘”“妈妈信谣害死女儿”的新闻,心里感觉自己的亲属群里不久就风清气正好多了,但后来当事人的母亲告诉当事人,他们又新建了一个亲戚群,只把当事人给踢出群了而已。因此,未来价值观一致的人会更容易聚集捆绑在一起,三观一致的人群亲密层次某种意义上会超过血亲关系,因为在网络社会里,亲属关系作用被减弱,而虚拟社群中的成员会因为价值观的相通、感情上的相惜、灵魂上的共鸣而容易走到一起,并有可能结成比血缘关系更加牢固的纽带。

当然,目前网络上还存在其他类别的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茧房对舆情的遮蔽现象,网民非常容易自动站队,在很多网络舆情热点事件背后都有此类遮蔽现象,但议题过于分散,在此不作赘述。

### 三、从后真相到后共识:基于社交网络的信息茧房“破茧”之道

学界将目前舆情传播中情感宣泄优于事实真相寻求的现象总结为“后真相”——真相就在那里并没有改变,民众只关注追求真相过程中的情感宣泄和宣泄,这也造成了目前舆情传播中情感泛滥和情绪转向的新现象,舆论引导的难度不断加大。在笔者看来,引导从本质上讲是共识达成的过程,共识具有动态性和多层面性,因此共识并不是一种结果性的横断面共识,而是一种过程性共识,即共识不是结果的完全一致,而是民众在追求真相过程中对不同阶层社会对话秩序和规则的认同,这种是一种程序性共识,因此,与“后真相”对应,这是一种“后共识”,而要建立“后共识”必须破除茧房中的回音室与信念回响效应,让圈子里的民众“破茧”出来表达,并在互动中形成对话秩序和对话规则,总体来说,目前的破茧之道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破壁”和“出圈”:破除舆情传播中茧房回音室负效应

从某种意义上说,基于社交圈子的信息茧房伴随着人类诞生之初就出现了,以后的信息茧房是基于地理空间的限制,由其社会交往的空间半径所决定,受当时的传播条件和媒介特质影响,社会交往的频度和广度都有限,一个人所思所想所关注的都是其周围的事情,圈子之间的互动基本没有。但随着工业文明时代来临,社会阶层多元和社会流动加速,酒吧、餐厅、网吧等公共空间扮演着公共领域的角色,不同圈子之间的互动与对话明显增加,传统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小圈子的意见气泡和小环境很容易被戳破。如前文所示,移动社交网络的崛起为人类的重新部落化提供了条件,反而形成了农业文明时期的意见气泡和茧房效应。因此,破解茧房中的意见回音室效应大抵有以下两个路径可以考虑:一是“破壁”,即打破不同圈层之壁,通过不同圈子之间的信息流动和意见互动,迫使圈子内的成员开拓视野,听到不同声音,从而破除社群内成员为自己群体及个人所贴的标签等身份枷锁以及“群里人说的都是对的”等偶像化误解,主流媒体必须要重新进入圈子,破除圈子自身的把关效应,影响圈子内的信息搬运工和重要桥结点人群,重建圈子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连接,再造主流媒体角色;二是“出圈”,让圈子里的成员走出茧房,破除舒适的意见小环境,到更大的社会对话平台进行对话,叠加社会共识,寻求不同意见阶层的最大公约数。政府和互联网平台必须在其中扮演更大的作用,在整个社会范围内重构社会认同机制和对话平台,进而最大程度地凝聚各数字部落的共识,改变不同族群之间的隔空喊话或鸡同鸭讲。

#### (二)构建社群情感按摩机制以改变社群“集体记忆”和信念回响效应

在社群内部,成员往往具有相同的社会阅历和共同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往往作为一种群体操持的认知框架在社群面对外部事件时起到价值预设作用,很容易触发群体情绪,而群体内情感的形成是群体认同中最为重要的认知基础,群体情感的形成会引发情感宣泄,进而外溢到社会大舆论场,形成群间的情感宣泄与激荡,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强集体记忆,形成一个集体记忆的建构闭环。

“尽管理性永远存在,但文明的动力仍然是各种感情,就像尊严、自我牺牲、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以及对荣誉的爱这些东西。”<sup>[12](P.117)</sup>情感已成为社会动员中最强大的动力之一,因此如果想改变社会个体的认知框、社群的刻板印象和集体记忆,

就必须隔断集体记忆形成情感集聚的链条,建构社交圈子全新的认知框架。而阻断集体记忆形成情感集聚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构建社会情感的按摩机制,不能任其宣泄进而固化原有的刻板印象和集体记忆。舆情关涉主体需要探究后真相背后的情感肌理,转移社会情感聚焦,构建多渠道的情感宣泄机制,通过不同层次“按摩”焦虑中的社群成员以缓解遍在的各类现代性焦虑,进而在新社会语境中建构社群成员“新情感结构”,以纾解“后真相时代”情感宣泄的后挫力。真相时代民众孜孜以求的是“真相”,尽管这种“真相”是建构的,那时候的舆情治理只要发布一篇“情况通报”或者召开一两场“新闻发布会”就可以处理舆情集聚,那时候舆情治理的第一要义是“解惑”;而到了“后真相时代”的舆情治理强调的是“解气”,即以纾解情感和宣泄郁结为第一诉求,以争取人心为舆情治理的第一要义,简单的“告知真相”已不能满足“后真相时代”民众的需求,“解气”更优于“解惑”<sup>[13]</sup>。

(三) 重构社会对话秩序和重建群际认同是未来舆情治理的重点

信息茧房最大的负效应是让整个社会族群之间的对话难度加大,只能躲在各自的小圈子里隔空喊话,而偶尔破圈的对话也是一种带价值预设的谩骂,因此,对话、共识和认同已是当下网络空间最为或缺的社会资源之一。群际之间固化的刻板印象和日益沉淀的“集体记忆”不能仅靠简单的说教和道德准则来统领整合,也不能靠简单的“宏大叙事”来弥合,只有重构社会对话秩序,“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观点,但尊重你说话的权利”应该成为互联网对话的基本原则与底线。“透明性”是近几年新闻生产中的热词,同样,在网络话语表达中要强调“参与的透明性”,将所有话语表达主体都纳入到社会对话的场域中,不缺位、不失语,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各主体进行必要的妥协和协商一致,在达到对社会对话秩序共识的基础上进而实现对结果、对事实、对真相的共识。

(四) “调和”和“互动”是网络舆情治理的根本要义

网络舆情治理是一个复杂工程,不能靠简单一刀切的做法和单向度的诉求“一蹴而就”,尤其是在茧房造成社群碎片化社会交往的情况下,若治理不当,有可能造成其原本就缺乏互信的、脆弱的互动和对话后撤,社群内成员退回到各自的圈子内部,并有意在外部形成边界,用自我保护性措施刺激茧房“内壁”增强,彻底隔绝和屏蔽外界信息,最终反而助长社会偏见,加大社会冲突风险。网络舆情传播系统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是一

个在平衡—不平衡—再平衡之间不断运动的自组织信息结构体。因此,对自组织的管理要采用柔性思维而忌用刚性思维,管理是“调和”和“互动”的手段,而不是直接的强力干预和阻断,需要调和不同阶层、不同圈群、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让茧房内的成员出来对话、互动,形成基本社会共识,只有这样网络舆情系统才能顺畅地发挥自组织效应,最大限度地降低信息茧房的负面效应。

#### 注释:

① 白岩松关于肃宁枪击案的报道以及回应,参见《白岩松回应肃宁枪击案报道:不是做<感动中国>》,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sh/201506/t20150619\_6769135.htm,2015年6月19日。

② papi酱被骂“婚驴”事件,参见:王钟的《为“冠姓权”怼天怼地对争取性别平等无益》,中国青年网,http://news.youth.cn/gn/202005/t20200513\_12325118.htm,2020年5月13日。

③ 关于广场舞大妈和青少年争篮球场事件,参见《广场舞大妈频与青少年争场地?专家:公共健身设施管理需更科学》,人民网,http://sports.people.com.cn/n1/2020/0628/c14820-31761009.html,2020年6月28日。

#### 参考文献:

- [1] 陈昌凤,霍婕. 权力迁移与人本精神:算法式新闻分发的技术伦理[J]. 新闻与写作,2018(1).
- [2] 喻国明,方可人. 算法推荐必然导致“信息茧房”效应吗——兼论算法的媒介本质与技术伦理[J]. 新闻论坛,2019(6).
- [3] 喻国明,方可人. 算法型内容推送会导致信息茧房吗?——基于媒介多样性和信源信任的一项实证分析[J]. 山东社会科学,2020(11).
- [4] 袁帆,严三九. 模糊的算法伦理水平——基于传媒业269名算法工程师的实证研究[J]. 新闻大学,2020(5).
- [5] 陈昌凤,仇筠茜. “信息茧房”在西方:似是而非的概念与算法的“破茧”求解[J]. 新闻大学,2020(1).
- [6] 丁汉青,武沛颖. “信息茧房”学术场域偏倚的合理性考察[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07).
- [7] 喻国明. 当前新闻传播“需求侧”与“供给侧”的现状分析[J]. 新闻与写作,2017(5).
- [8] 胡泳. 新闻探讨:回声室效应[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6).
- [9] 李彪. 后真相时代网络舆论场的话语空间与治理范式新转向[J]. 新闻记者,2018(5).
- [10] [德]海德格尔. 技术的追问[M]. 孙周兴,等译. 上海:三联书店,1996.
- [11] 李强. 职业共同体:今日中国社会整合之基础——论“杜尔克姆主义”的相关理论[J]. 学术界,2006(3).
- [12] [法]古斯塔夫·勒庞. 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 戴光年,译. 武汉:武汉出版社,2013.
- [13] 李彪. 霸权与调适:危机语境下政府通报文本的传播修辞与话语生产——基于44个引发次生舆情的“情况通报”的多元分析[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4).

收稿日期 2021-12-26 责任编辑 刘立策